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根源

包桂芹

(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依据认识论解释原则,原始先民对自然懵懂无知,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从而屈从自然、崇拜自然,这是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从认识论和生存论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新视角看,以人神(自然)沟通祭祀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萨满教有其深厚的物质生产生活根源。萨满教文化之所以历经多个世纪流传至今,绵延不绝,是因为萨满教文化的生存技能、文化医疗技能有深厚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自然观根源,这是萨满教文化得以延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在。

关键词:萨满教;蒙古族;自然崇拜;历史文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5-0024-04

在原始社会生活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神秘感更强烈,万物充满神性和灵气是远古人类的普遍观念。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原始宗教观念无不把自然万物神灵化。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思想为根基的原始自然宗教。“萨满”一词,来源于满-通古斯语,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皆称其巫师为“萨满”,雅库特人称萨满为“奥云”,而蒙古族称女性萨满为“奥德根”,称男性萨满为“勃额”。萨满教对自然力、超自然力以及灵魂的崇拜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族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16世纪下半叶,随着喇嘛教第二次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区,萨满教受到排挤,其传播力被削弱。然而,萨满教并未消失殆尽,在很多地方,萨满教与喇嘛教相互交织混杂,萨满教的守护灵也进入喇嘛教,成为其守护神。蒙古族先民长期尊奉的萨满教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蒙古族民间。

一、蒙古族萨满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依据认识论解释原则,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智力水平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也无法预测和控制各种自然灾害,在神秘的自然面前束手无策。于是,人类就把自己无法驾驭和支配的神秘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崇拜的对象加以膜拜并供奉。由此,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应运而生。那么,原始人类究竟是以何种宗教观念来表达崇拜对象的呢?多数学者认为,囿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的限制,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是在灵魂观念之上产生的“万物有灵论”。由肉体死亡而灵魂不死的观念产生了对逝去的氏族祖先之亡灵的崇拜;由万物有灵而逐渐产生了对各种神秘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崇拜。但早期人类因科

收稿日期:2016-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与当代生态伦理学”(11YJA720001)

作者简介:包桂芹(1966-),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

学认知能力低下,还无法区分人与自然物的差别。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先民常常把氏族的祖先与自然万物当成同类,据此产生了最早的图腾崇拜和半人半神的女性始祖崇拜。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的逐步提高,原始人类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也就自然得以区分,并且,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祖先崇拜对象由女性崇拜逐渐演变为以男性崇拜为主。

因此,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产生于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人类以虔诚的心理、炙热的情感谋求与强大而神秘莫测的自然和解,不断克服莫名的恐惧心理,进而谋求生存空间的扩大、生存技能的提高和种族的繁衍,以期不断探寻自然的奥秘,破解人类生存遭遇的种种窘境。在此过程中,自然崇拜显示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氏族人群智力水平较低,对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控制自然力,于是将自然视为超自然的异己力量并加以供奉且服从;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征服欲,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以此改变自身的命运。概而言之,原初世界的本质是神秘的,原始人类无法认识它,只能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崇敬爱戴它。于是,“敬畏生命”“敬畏神灵”的信仰产生。原始先民因对自然的懵懂无知而畏惧、崇拜神灵,自然万物也因此被赋予神奇的魔力。与此同时,人类苦于无法操控这种神奇且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力量,但又不甘心在神灵面前坐以待毙。于是想方设法与之沟通交流,以便通过神人沟通的方式,将人的想法传递给神,让神灵知晓人的心愿,从而达到驱灾降福、降魔除妖、佑护人类的目的,同时希冀通晓神的意愿、想法和要求,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和牺牲,祈求神灵的庇护。而履行人与神灵之间沟通交流职责的人就是萨满。因而,宗教是“由于人对光明,对文化或至少对文化目的的需要而发生出来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生活上最初的然而还粗鄙和庸俗的文化形式;所以,人类文化上每个时代,每个重要阶段,都是伴同宗教而开始的”^[1]。

二、蒙古族萨满教传播的生存论根源

单纯以认识论视角论证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根源是不全面的。如前所述,在原始信仰的支配下,人类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赋予自然以神奇的魔力,甚至还认为,人类苦于无法操控神奇且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力量,但又不甘心在神灵面前坐以待毙。其实这种认识论解读忽略了宗教信仰的本质特性,宗教对崇拜对象的信仰原本就是由衷的、虔诚的,而且对自然、神灵并无操控的企图。只有当我们用现代观念赋予古人以现代意识,才会认为古人凭借想象力赋予自然以神奇的魔力,其实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本就认为自然界是神奇的,且对神灵崇拜具有心甘情愿的一面。因而,我们还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的视角进一步揭示萨满教的根源。

萨满教作为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见证者,是随着原始社会氏族制的形成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赖以形成的基础是中国北方民族传统的渔猎、游牧经济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原始氏族社会组织。因而,萨满教文化是原始氏族部落宗教宰制下的原始人类文化的积淀。萨满教文化有其深厚的物质生产生活根源。关于萨满的产生,学术界普遍认为起源于太古时代。例如,在采集经济时代,萨满组织人们趋利避害,寻找食物。原始狩猎时代,萨满带领人们围追猎物。氏族社会形成以后,萨满往往是氏族首领。萨满组织全体氏族成员进行各种生产实践活动,统一有序地安排氏族成员的生产生活,处理氏族内外大小事务纠纷;遇到各种天灾人祸,萨满通过各种祭祀仪式,运用巫术、占卜等方式与神灵沟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祈求消灾解难,达到安抚人心的目的,给大家以精神上的慰藉。在母系氏族社会,萨满教已经相当发达。萨满大多是氏族首领,只是后来逐渐从氏族长兼任演化为专职化,原因是氏族长平日处理氏族内外的公共事务本就非常繁忙,再去主持萨满教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深感力不从心,因而萨满活动开始由专职的萨满来完成。而且在母系氏族社会,萨满多是女性,人们称其为“巫”。从萨满祭祀仪式的基本动作来看,多是古老的女性舞者的动作。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人们一般称男性萨满为“覡”。萨满教后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萨满在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练就的生存技能、文化医疗技能,成为人类多样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

组成部分。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萨满本质上是一种能够进入有节制的狂醉状态后达到宗教目的的人”,“能够使人们与神灵交流的狂醉,本质上是一种技巧”^[2]。所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萨满教文化作为原始宗教文化,在远古氏族社会中起着主导支配作用,贯穿于古代氏族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引导和规约整个氏族部落成员生活的行为准则。

“萨满教文化在原始哲学、神话、族史、医学、法律、象征、符号与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地理、航海、预测,以及生产技艺、生活智能与知识等诸多方面,均有独特的贡献与成就。”^[1]尽管萨满教文化“不可避免地泛聚着历史的污垢和陈迹。但是,它的主流却正是汇聚了一个民族漫长历史上所创造的积蓄下来的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智慧和精神财富——人类祖先的文化足迹和全部文化遗产”^[1]。已然走向没落的以人神(自然)沟通祭祀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古老的萨满教,存在某些如论者所言的“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萨满教遗俗,但如此种种,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三、蒙古族萨满教延续的文化根源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1)}萨满教本质上是人类早期文化的一种形式。古老而命运多舛的萨满文化历经几个世纪风霜雪雨的冲刷洗礼,为何会流传至今,绵延不绝,有学者认为,现已不存在这种信仰的很多社会里仍有萨满教,是因为萨满教技巧的遗存^[2]。然而,萨满教技巧不是一般的生存劳动技能,也不是一般的疗伤治病解痛技能。体现萨满教技巧的生存技能、文化医疗技能,有其深厚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自然观根源,这是萨满教技巧得以延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在。萨满教文化为氏族、部落乃至社会的发展,创造和保留了大量神话、训谕诗、祭祀程序、礼仪、祭祀规则、祭祀歌舞等文化传统,使萨满教文化的容涵性、民族性、时代性及当代影响愈加显著。富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萨满教文化,都是历代以该民族担当人神沟通使者的萨满们为主要创造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因此,“萨满是萨满教文化的思想家、文化知识的践行者与构筑师”^[1]。《多桑蒙古史》也有此方面的记载:“珊蛮(萨满)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都、医师于一身。”^{[4](204)}基于此,原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之历史遗存都是与同一定时代民族萨满须臾不可分的。萨满教在进行人神(自然)沟通交融的过程中,皆使用本民族语言,充分利用本民族语言优势,更易为本民族民众所接受。因而,萨满在占卜或治病时,只有熟悉和掌握一定区域民族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文化规律,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萨满教的宗教崇拜形式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风土民情、民规民约、习惯法、禁忌等。采用本民族耳熟能详的肢体动作语言和约定俗成、融会贯通的口语方言等交流传导方式,能够达到“萨满祭程不外泄、唯族内晓彻、世代承替自立目的”^[1]。

在萨满教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祭礼、占卜、禳灾、祛病、歌舞等传统文化形式,保留着各民族丰富的原始文化信息的接续传递方法,具有极高的考古学、人类学价值。例如,在布里亚特蒙古族萨满巫俗中,风也是崇拜敬畏的神灵。在没风的时候,通过吹口哨就可以把风神从其居住的山中叫出来;如果空中刮起了旋风,他们就认为这是由旋风的恶神引来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认为雷鸣是龙生气后发出的巨响。蒙古包或人畜遭雷击皆因人的某种不敬行为惹怒雷神,于是便请萨满到雷击之地来禳灾。萨满到此地拿出蓝旗供上,然后念咒祭旗,使那个地方重新“清洁起来”,以后就可免遭雷击。这一萨满教念经祭雷仪式在近代科尔沁萨满祭雷活动中仍有留存。科尔沁萨满文化传承形态还有以下两种:一是科尔沁传统正骨文化。它源于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文化。据专家研究,清代科尔沁有名的正骨医那仁阿柏(1770~1855)是成吉思汗最崇拜的萨满大师阔阔出后代的徒弟,科尔沁萨满首领郝布格泰的后裔。她从小酷爱萨满法术和正骨术,14岁就掌握了萨满法术和正骨的全部技巧,荣获“正骨术的沃德根”的称号。科尔沁萨满文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主要原因是祭祀求

福和驱魔治病,其中,驱魔治病占主导地位。二是科尔沁安代文化。科尔沁安代舞源于古代蒙古族萨满文化。这种舞蹈的最初功用在于它采用精神疗法和体育疗法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有关蒙古族萨满通过安代治病的起源,有如下传说。

很早以前,在郭尔罗斯前旗,居住着一户老牧民。老人只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他相依为命。他的女儿热爱劳动,能歌善舞,像磁石般吸引着无数钟情的小伙。女儿长到18岁那年,突然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吃饭不知饱,一笑不知停,唱歌没有完,出去不知归。老牧民悲愁不已,四处奔走求神拜佛,但都无济于事。于是,老牧民把心爱的女儿拉在勒勒车上,离开故乡四处周游。一天,他们来到库伦旗一个流水潺潺、树木成荫的地方时,车辕断了。老牧民把车停在树下,为了消愁解闷,也为了减轻女儿的病痛,就甩着手巾绕牛车边赶蚊子,边手舞足蹈地唱起来。附近的一些男女青年被这动听的歌声所吸引,陆续前来观看。青年们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学着老人的舞姿,挥着手巾唱起来,热闹非常。这时,车上的姑娘也渐渐抬起头,直起腰坐起来,慢慢加入到歌舞行列之中。欢快的歌舞很快就治愈了姑娘的病痛。从此,安代就成了萨满教用来医治精神疾病的方法了。^[5](233~234)]

如今,安代文化已成为科尔沁文化的一大特色。由此可知,真正的萨满确实掌握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巫术本领,尽管那些本领中带有一些瞒天过海、遮人耳目、令人迷惑、无法解释,甚至带有欺骗性质的成分,但其背后却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医疗技术、民俗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的支撑,更有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原始文化根源,否则,萨满就无法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在缺医少药、远离城市、知识匮乏、民风淳朴的乡土社会中,萨满通过驱鬼、禳灾、招魂、祛病等巫术活动缓解了一些民众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痛。尽管这些手段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不免幼稚浅薄、荒唐可笑,难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提并论,但是这种“自发的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成分,较之于科学之实验手段,神话之艺术手段,它同样有其积极意义。当然,除了那些辛辛苦苦掌握和修炼了真本领的萨满巫师之外,也不排除为捞取不义之财而行坑蒙拐骗之术的冒牌萨满巫师,这在各民族萨满文化中都曾发生过。

总之,从认识论视角看,在生产力和人类智力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中,人类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从而屈从自然、崇拜自然,这是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从认识论和生存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萨满教文化有其深厚的物质生产生活根源。之所以古老而又命运多舛的萨满文化历经几个世纪流传至今,绵延不绝,是因为萨满教的生存技巧不是一般的生存劳动技能,也不是一般的疗伤治病解痛技能。萨满教的生存技能、文化医疗技能有其深厚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观念根源,这是萨满教文化得以延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在。无论是已然走向没落的古老的萨满教遗俗,还是丰富的萨满教文化,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民族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 富育光. 萨满文化析论[J]. 社会科学战线,1999(6).
- [2] [英]卡罗琳·汉弗莱,那顺巴依尔. 关于北亚萨满教的几种理论[J]. 蒙古学信息,1997(3).
- [3]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4] 宝力高.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 [5] 色音.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海晓红】